

DANGDAIJINGJIXUEXILIE
CONGSHU ●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
● 陈郁 罗华平等译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译库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DANGDAI JINGJI KE XUE JI CHU BING SHU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 [美] 道格拉斯·C·诺思著

● 陈郁 罗敏宇译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财 B0077008



当代经济学家文库

CD29/28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

登录号 391530

分类号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81

根据美国 W. W. 诺顿出版公司198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翁顺英

封面装帧 宋珍妮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美〕道格拉斯·C·诺思 著

陈郁、罗华平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骏印刷厂印刷

1994年12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3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86000

印数 8,001~11,000

ISBN 7-208-01872-3/F·349

定价：15.00 元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1973年，美国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该书与其说是对经济史进行细致缜密研究的专著，还不如说是一部洋洋洒洒、高屋建瓴的史论。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也没有在经济史的数量研究方面提出新的具体成果，但它却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因为它为经济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前景，即：根基于当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用最先进的经济理论去重新解释历史。该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

诺思，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2年和1952年分别获得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博士学位，1946年至1982年间曾先后任教于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赖斯大学和剑桥大学。1982年，他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任教，在该

校经济系任亨利·R·卢斯讲座法律与自由教授。此外，他还担任过《经济史杂志》副主编、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东部经济协会会长、经济史协会会长和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

《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出版可谓是一“书”激起千层浪。不过，这篇史论更注重的是史——历史的史实，而诺思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则更注重论——历史的理论。在后一本书中，他不仅对自己在前一本书中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完善，而且还进行了理论总结，由此提出了在新经济史学派中独执牛耳、独领风骚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触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

1

长期以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一直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经济史的作品不论是采取编年史法还是采取主题叙述法，都往往是材料的堆砌和罗列。经济史就像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政治史、法律史和技术史等）一样，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研究领域不同而已，而没有表现出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和不够先进的。如果说，任何一门科学的大家、里手都是“哲

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和历史观，都从自己的角度和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那么，经济学家理应用自己的学术武器——经济理论——去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何况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一种较为严密和有效分析问题的方法。^①诺思教授和以其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正是这样做的。新经济史学的兴起一下子改变了经济史学本身的历史，从此经济史学家才真正开始用经济理论去研究历史；理论与历史被溶于一炉。这一进步在经济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不仅经济理论的应用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而且理论应用还导致了一系列发人深省、与传统观点迥异的结论。无疑，这是一场革命。

正如任何一场学术革命都离不开方法论上的革命，经济史学中的这场革命的缘起，便依赖于理论经济学最近一次的革命——“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宏观经济学以及由此而后形成并完善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所有这些都成为经济史学家分

^① 以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用经济理论成功地分析、研究了政治活动中的许多问题，布坎南本人获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为明证。

析经济史的强有力工具，而传统的经济史学研究方法是无法与此相比的。最起码，这些理论方法能对以往的统计资料重新进行分析、研究。基于此，在新经济史学革命的诞生地——有关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诺思教授一反传统，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包括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法和经济计量法等），首先对1790—1860年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了经验性研究，由此被认为是对其他经济史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是采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方法改写美国经济史的一项杰出成就，同时也是重新编写美国经济史的开端。这以后，诺思教授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型，这项成果集中体现在《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1961年）一书中。为此，诺思教授曾自豪地说：“在美国经济史中正进行着一场革命。这是由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发起的。他们怀疑对美国经济史的传统解释。他们确信，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实的基础。”^①

当然，对经济增长因素的重新核算必然引发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究，诺思教授也不

^① Douglass C. North,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LIII, No. I, Part I (1963).

例外，何况，经济增长问题在新经济史学派兴起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是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不过，诺思教授没有去完善凯恩斯主义式的增长模型，而是独辟蹊径，力求以制度的变迁来解释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能，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反例。例如：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诺思教授正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

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使得诺思教授的这篇论文不仅成为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而且也启迪他从此以后就制度变迁这一课题进行深层的、全面的和理论的、历史的研究。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只不过在方法上为诺思教授对历史材料进行实证性分析提供便利的话，那么，新古典理论则在理论上为他对历史分析进行规范性归纳提供了“哲学”基础。换言之，在诺思教授的新经济史学中，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仅仅是工具而已，而其理论的“精髓”则是新古典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和理论规范。这在诺思教授以后对制度变迁的一系列研究中是昭然若揭的。

2

任何一种建立理论的念头尽管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或对历史素材的分析中的若干思想火花，但被建立的这种理论本身必须首先解决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被研究对象的运动原则和机制问题等，也就是说，免不了一次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诺思

教授建立制度变迁理论的起点就是系统阐述了有关制度的原则和过程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具体作品就是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与兰斯·戴维斯合著）。就像一篇同名论文的副标题所示：这是走向制度创新理论的第一步。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狭隘性，即它们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而现在就是要冲破这种狭隘性去发展一种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

对于制度，在我们看来，它既然像诺思教授所论证的那样也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那么，它作为主体行为的结果的客观运动，与其他生产要素在某些方面，尤其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会有一些的相似之处。果不其然，诺思教授根据自己早期对美国经济史的多方面的定量研究，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及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可他们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在美国

历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总收益的增加而同时又不使个人收益减少。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具体分为这样5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从诺思教授有关制度变迁的这些基本立论中不难看出，其欲建立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通常的经济增长理论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而后者将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和已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都以收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理论的起点。

值得指出的是，诺思教授在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不仅归纳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而且还多次考察了美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产权含义，即制度变迁与产权结构的关系。产权理论的盛行及其完善，为他用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解释西方经济的历史，即理论由“抽象”到“具体”创造了学术背景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诺思教授这项研究工作的纲领性和宣言性文献就是《西方世界

的兴起》一书(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该书可追溯到诺思教授分别于1970年和1971年发表的《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均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如果说,诺思教授以前只是不自觉地意识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会作贡献,那么,在这两篇论文中,他却自觉地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该书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①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反观通常的观点,则是将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在诺思教授看来并非如此,它

^①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页。

们本身就是增长。因此，产业革命就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之所在，而恰恰是其结果。

这些观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当然，诺思教授的观点是通过公元900—1700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而得出的。历史上的产权没有做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其原因就在于或是没法阻止“搭便车”行为，或是创立和行使产权的费用超过了收益。我们也曾为这样的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出现呢？诺思教授的理论无疑使我们茅塞顿开。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因此它们首先在西方世界崛起，而法兰西和西班牙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在竞争中失败并大大落伍了。

由于诺思教授成功地将产权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作了重新解释，因此，他对西方经济史的考察成为“产权运动”的四大支柱之一^①，他本人亦成为产权学派一方的代表人

^① “产权运动”的其他三大支柱是：交易费用概念、产权经济学和比较经济组织研究。参见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5页。

物。这恐怕是包括诺思教授在内的人士都始料不及的。

3

诺思教授一系列有关制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发表后，一时间，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追随者甚众，当然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一些批评和修改意见，为此，他又对原来的论点和框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翻译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诺思教授这项工作的完成。

顾名思义，《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是研究分析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那么，何为“结构”？何为“变迁”？根据诺思教授自己的论述，“‘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见本书第225页）。尽管诺思教授在书中论及了经济、政治乃至社会诸方面的结构与变迁，不过，对此他均是通过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去解释、说明的。需要指出的是，诺思教授及其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乃至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以科斯教授为代表的新

制度经济学^①所研究的制度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见本书第225-226页)，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体制(system)，如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一般地讲，体制多指系统，而制度强调的是关系。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思教授论述了西方经济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他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样三个变量上：(1) 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2) 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3) 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由此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

众所周知，自科斯教授开创了产权理论的先河后，经过阿尔曼·阿尔奇安和哈罗德·

① 此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与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有着天壤之别。有关两者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可参阅科斯教授《新制度经济学》一文。该文中译文载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德姆塞茨等人的努力，产权理论不仅声誉日隆、影响日盛，而且理论本身也愈来愈精细了。它的发展有助于人们解释人类历史上交易费用的降低和各种经济组织形式的替换。如果假定国家是“中立”的，根据产权理论，在现存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约束下，在充满稀缺和竞争的世界中，解决问题的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竞争将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替代无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为此，人类在不断地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努力着。有效率的产权应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这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并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不然的话，将导致交易或契约安排的减少。显然，诺思教授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并没有多大发展，可诺思教授处理问题的独到之处则是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因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所以，在诺思教授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的活动倾向，又要能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而这一点通常为人们所忽视。